

# 目 录

## 编者的话

|                                    |     |     |
|------------------------------------|-----|-----|
| 回忆我的三姐彭为和.....                     | 李 澄 | 1   |
| 回忆我的三弟彭为工.....                     | 李 澄 | 4   |
| 回忆我的爸爸彭炳坤.....                     | 彭 新 | 10  |
| 回顾我在上海的战斗生活.....                   | 黄济民 | 19  |
| 战斗在上海.....                         | 黄 明 | 27  |
| 理想与征途.....                         | 彭梦庚 | 42  |
| 我的回忆.....                          | 李 澄 | 76  |
| 我的少年时代.....                        | 彭 塞 | 85  |
| 李家珍是怎样去延安的.....                    | 彭明先 | 96  |
| 回忆抗战初期“夹江县民众救亡<br>歌咏团”的建立及其活动..... | 彭明先 | 98  |
| 夹江的救亡运动和重建党的组织.....                | 陈其祥 | 101 |
| 夹江解放纪实.....                        | 彭安芳 | 107 |

# 回忆我的三姐彭为和

李 澄

我三姐彭为和，一九一六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从小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并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她就读于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初中，一九三三年考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三五年毕业。

她在学生时代即接触到与彭家关系密切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李亚群、桂屈、孙文石、彭明先等人，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再加上她父母亲思想的影响，致使其从小便向往于共产主义的美好世界，并具有将来作一个革命战士的崇高理想。

为和在家常为党做些传递工作，在校则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她十分喜读中外文学名著，其中对针砭时弊，尖锐锋利如匕首，如投枪的鲁迅杂文，尤其爱不释手。她自己也喜欢写杂文，在学校念书时就写过一些杂文在墙报上发表。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常以“恒沙”、“风荷”等笔名，写一些笔调尖锐的杂文在进步报纸刊物，如《大声周刊》、《星芒报》、《新民报》等报刊上发表。

一九三七年初，为和参加了中共四川地下党领导的以革命青年为核心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她被编在文化界的民先区队部工作。一九三八年初，经李亚群介绍

参加中国共产党，编在文化支部。她的理想终于变成现实，她全力投入了党的文化宣传工作。就在这年暑假，她把成都南城小学的师生组织起来（她在南城小学任教），成立“孩子剧团”，到双流、新津、彭山、眉山、夹江、峨眉等县进行宣传演出，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一九三九年初，为和进入中共四川地下党的机关报《时事新刊》工作，任国际版编辑。她除每周撰写国际时事评述外，还用“恒沙”笔名写杂文，揭露国民党的暴政，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并和其他同志一起，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时事新刊》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发行量激增；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则把它及在其中的工作人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将其中的人列入了黑名单。

这时为和还参加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工作，以学会为基地，常和四川的同行进行业务技术交流。同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传播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诬蔑是共产党领头干的，于是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跃先同时被捕，《时事新刊》编辑、共产党员朱亚凡当抢米事件发生时，路过那里，也被抓起来。朱亚凡曾分辩说：“我是《时事新刊》的记者”。特务们说：“《时事新刊》是共产党的报纸，正要去抓你们，来得正好”。第二天，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抢米事件是共产党干的，带头的就是《时事新刊》记者共产党朱亚凡。并于当天就公开把朱亚凡枪决了。朱亚凡英勇牺牲，成都黑云四起，暗无天日，人民遭受苦难。

由于成都地区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南方局决

定把暴露了的共产党员及时转移，隐蔽精干，保存党的有生力量。

根据中共川康特委的通知，《时事新刊》被查封后，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已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全是搜捕对象，必须紧急撤退，躲避敌人追捕。彭为和马上转移曾先后隐藏于九眼桥夹江纸栈和夹江亲友处。在夹江隐蔽期间，得到党的通知，要她去重庆红岩村南方局，为和机智地避开敌人到了重庆，在南方局招待所住了一个月，最后她换上八路军军装，坐上军车，从重庆经成都、广元、宝鸡、西安，最后到达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为和到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分配她到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由于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时，人少事多，积劳成疾；抢米事件后，又东奔西跑，生活不安定，营养不良，因而得了肺结核。在女大学习了两个月后，便感到不能支持，旋即经组织决定送到延安柳树店白求恩医院治疗。

当时陕甘宁地区被国民党大军包围、封锁，医药缺乏，要治肺结核需要青霉素、链霉素，而医院只有磺胺。这时，正好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邹风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学习，经过他的关心，将缺药的情况报告了中组部，由中组部批准从西安办事处买了一些链霉素回来给为和治疗，延缓了她的病情恶化的时间。我和四表弟彭炳坤、老战友张桂、江思源等每个礼拜天都到柳树店医院去看望她，尽量带去一些营养品给她增加营养。她的情绪也一直很好，希望快些回到学习、工作岗位上去。但是药物的力量有限，病情逐渐恶化，人一天天瘦下去。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延安柳树店白求恩医院。终年仅二十五岁。

# 回忆我的三弟彭为工

李澄

我的三弟彭为工，生于一九二三年。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下午，在华北八路军总部任电台队长时，随左权将军在晋东南辽县反击日寇的扫荡中光荣牺牲，终年十九岁。

为工出生于旧社会的“叛逆”家庭，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因而还在他读小学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理思，有志气的少年。并且为四川地下党做了不少秘密的传递等工作。

为工还在初中念书时，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是“天明歌咏团”的成员，常以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所作的革命歌曲来唤醒民众，救亡图存。

一九三九年为工参加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秘密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中共四川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和地下革命斗争。由于学校在西城，他就编在成都民先西城区队部。当时革命烈士张露萍（余硕卿）正在建国中学念书，参加了“民先”，也编在西城区队部。他们经常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亲如姐弟。张露萍比为工大三岁，把为工叫三弟，为工把露萍叫四姐。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四川地下党介绍张露萍、周玉斌、刘玉丰、李隆蔚等去延安学习。张露萍以喜悦的心情告

诉为工：“三弟，我要到延安学习去了，你怎么样？”为工说：“四姐，我也要延安去。”露萍说：“你家里能同意吗？”为工说：“我哥哥早去了延安，我要去，爸爸妈妈不会阻拦的，他们的思想都很进步。”露萍又说：“你太小，出远门有困难。”为工说：“你别说我小，人小志气大嘛，何况路上有你们几位大姐姐照顾。一定没问题”。他这种精神，使大家都非常感动。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经家庭同意，中共四川地下党批准，彭为工跟着张露萍、周玉斌等出发了。他们带的钱不多，沿途很节约，有时吃两个大饼就当一顿。在广元、宁羌遭到国民党军警检查站的盘问，由于张露萍年纪稍大，有点社会经验，每次检查都由她出面对付，走一站说一站。到宝鸡前说是“带弟弟到宝鸡走亲戚人户的”。为工当时年纪小，只有十四岁，个子不大，就回答跟四姐到宝鸡走亲戚。其他人都编好了一套假话，装着互不认识，蒙混过了军警检查站。为工年纪最小，同行的都叫他小弟。他们一路患难与共，休戚相关，靠着集体的智慧来对付国民党的检查，向西安前进。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到了西安。按照四川省党组织交待到西安七贤庄一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接头，才能到延安去。当时七贤庄周围住着严密监视办事处的国民党特务，到延安学习的青年走错了门就会被抓起来，东张西望打听八路军办事处的也会遭殃。

她们到了西安之后，张露萍和周玉斌把大家安置在旅馆里面，她们二人先到七贤庄附近，远远地看准了八路军办事处，象过路的行人一样到了办事处跟前，突然就进去了，使

敌人措手不及，不能下手。见到了办事处的人，提交了介绍去延安学习的关系。当时全国各地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去学习的很多，办事处招待所床位很少，都住满了。有的有介绍关系，有的没有介绍关系。办事处进延安的军车很少，只能分期分批进去，有的还要步行。办事处叫他们在西安旅馆中等候通知，安排妥当再到延安。

正在这个时候，露萍的大姐夫，川军师长余安民派了一个少校副官来西安抓她回去，不要她到延安。少校副官通过当地国民党军警关系，在旅馆中查到了张露萍。当时张露萍改名为黎琳，副官在旅馆中堵住，躲也躲不了。副官说是奉余师长之命，请她回成都去，把飞机票也买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张露萍怕影响大家都去不成延安，只好一面用话稳住副官，一面乘机跑到八路军办事处汇报，要求把同行的青年先转移到办事处去，她独自一人设法摆脱副官的控制。办事处同意了这个要求，把周玉斌、李隆蔚、彭为工等转到了办事处招待所，提前到延安去。叫张露萍和副官周旋几天，先到西安附近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住一段时间再到延安去，这样才能摆脱控制。

彭为工告别了张露萍和周玉斌、李隆蔚等由办事处的军车送到延安。最初中央组织部安排他们在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学习，三个月后便分配到前方工作。为工时年仅十五岁，便留在中央军事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准备毕业后作军事机要人员。

为工在军事通讯学校中，由于思想敏捷，学习努力，很快掌握了无线电通讯技术，成为学校的优秀生，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他刻苦钻研业务技术，业余

时间还喜看中外文学名著，爱写诗歌及短文，除在学校墙报上发表外，也寄回四川给亲属们看。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苹果诗人”。这个外号的来源，是他写了一首诗歌赞美苹果在北方地区不怕严寒的高风亮节，写得很好，同学们都赞赏。同时，又因他年纪很轻，圆圆的小脸，白中带红，象苹果一样，同学们把他的外号传开了，很多人都知道。“苹果诗人”即彭为工。

一九三八年冬，为工在军事通讯学校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良，分配到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办公厅机要科作报务员，为中央军委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场传递消息。由于工作中的实际锻炼，他在无线电技术业务上有很大的提高。

张露萍按照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终于摆脱了副官的控制，到达了延安。在延安，为工经常和她见面，互相鼓励，互相帮助。

一九三九年初，由于前方需要机要干部，中央军委组织部把为工派到华北八路军总部任电台队长。在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左权将军的直接领导下，为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指挥华北抗日战场具体传递信息，对上和延安军委总部联系，对下和八路军三个师部联系。电台队长按指挥员的意图，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准确地发出各种信号。在军事机要工作上，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九四二年五月，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日军在华北辽县地区反复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八路军总部是华北日军的主要对手，日寇把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总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集中了三万多人的兵力，对华北地区进行铁壁



合围的反复扫荡，妄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当时八路军总部指挥的三个主力师都分散在华北各地作战。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在晋冀鲁豫；一二〇师在贺龙、关向应领导下在晋西北；一一五师在林彪、罗荣桓领导下在山东地区。八路军总部直属指挥的警卫团也在外围作战。在晋东南辽县地区只有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华北局、北方局党校、新华日报、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等单位共约万余人，部份是非战斗人员，绝大多数没有战斗经验。

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开始，日军用四个师的兵力向晋东南地区铁壁合围，步步为营，搜索前进。在这紧要关头，北方局代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召开反扫荡动员大会，号召坚壁清野，精减辎重，能拿枪的拿起枪来参加战斗，老弱病残即早疏散撤退。彭德怀副总司令带了一个骑兵连向东南冲杀出去，结合野战部队，指挥华北地区反扫荡战争；参谋长左权将军亲自带领八路军总部人员进行反扫荡突围。左权将军身先士卒，走在部队最前面，第二个是警卫员，第三个是电台队长彭为工（他背着电台），第四个是报务员舒新怀。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下午四时，突围部队且战且走，向东南突围。山头上都是日军。用机枪、大炮封锁了山口。六〇炮、榴弹炮不断向部队打来，硝烟弥漫，炮声震天。一发榴弹炮打来落在队伍的最前面，左权、警卫员、彭为工同时中弹。肢体打坏，倒下去了。后面的同志赶快上前抢救，但再也起不来了。同志们含泪把烈士们抬到山沟里，取出证件、文件和为工背的无线电台，继续突围前进。下午四点半钟冲过山头，通过了封锁线，突围部队才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过了几天，彭德怀副总司令带着野战部队打了回来，清理战场，找到了左权将军和他的警卫员，以及彭为工三位烈士的遗体，当即安葬在辽县东南的山坡上，坟园坐北向南，守望着祖国的大好河山。

## 回忆我的爸爸彭炳坤

彭新

我的爸爸彭炳坤，一九二三年出生于一个纸商家庭。他从小学毕业后，因祖父有重商轻学的思想，未让他继续读书，小小年纪，便被送到成都商业场一家正头铺当学徒。旧社会学徒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他受不住老板的奴役，中途便离店回家了。一九三七年，年仅十四岁的爸爸，便到夹江土门乡的一所村小当教师，自谋生活。学生一放学回家之后，剩下他一人，十分孤独。一日两餐，都得自己动手，因村小离场镇较远，购物不易，所以常常是盐巴下饭，过得十分清苦。

我的大伯彭明先，是共产党员，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在监狱里关着。三八年初回到夹江，积极开展夹江的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夹江县民众救亡歌咏团”。许多爱国青年都参加了歌咏团的活动。我父亲小时受大伯彭明先的影响，幼小的心灵里，早就埋下了革命的种籽。值此国难当头，抗战烽火熊熊燃烧之际，他怎么能安心于山村的寂寞生活呢？恰于此时，我大伯到土门小学去看他，两人一说即合，我父亲马上搬行李回城，迫不及待地就投入到大伯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由于我爸爸的积极热情，他很快就成了歌咏团的骨干分子，并由他带头成立了“晨呼队”。每天绝早，一批青少年

在他的率领下沿街高唱救亡歌曲。“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歌声把人们从梦中唤醒，有的还睡在床上，就应着外面的歌声唱起来了。

一九三八年夏，大伯的难友陈其祥来夹江，住在大伯家里，不久，大伯离开了夹江，歌咏团的工作，由陈其祥接替领导。陈和爸爸相处很好，情同手足，工作上更是陈的得力助手。不久，陈其祥的组织关系恢复，在夹江开展建党工作，由他介绍，我爸爸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当时年仅十五岁。一九三九年初，中共乐山中心县委批准夹江成立特别支部，陈其祥任书记，蒋松萍负责组织，彭炳坤负责宣传。支部随即在县城组织染纸业工会，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开办工人夜校，我爸爸亲自担任教员，还兼负“小学教师普教促进会”的宣传任务，参加寒假宣传团到全县各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一九三九年春，经中共乐山中心县委批准，陈、彭二人决定到延安学习。他们两人于三九年十月十日自成都出发，分乘黄包车到达绵阳，然后徒步到达碧口，当晚住在邹风平同志的好友杨善宝家中（持有邹风平同志的介绍信）。杨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临行还分别赠送了他们每人拾元钱作路费。他们由碧口绕道至甘肃，再由甘肃到宝鸡，由宝鸡乘火车到西安，他们扮作商人，混过了沿途军警的盘查。

他们到达西安后，经过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便留宿在办事处招待所里。十一月份方乘办事处军车到达延安。

我爸爸由于年纪小，先被编入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了半年，毕业后，才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第九大队的正式

学员。队长是雷玉庭，指导员是黄延卿。学习期间，他刻苦钻研，积极向上，进步很快。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安塞县的军委二局做译电员工作，其后又调到总参谋部工作。他每次都是愉快地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干一行，爱一行。

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发动野蛮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对根据地的围困、封锁，致使根据地的军民面临着严重困难，物资十分缺乏。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调他到边区物资局光华商店作会计。由于他工作积极，学习刻苦，因而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会计业务，不久，被提升为会计股长。他遵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改善边区的物资供应，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九四二年，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十月，康生利用整风大搞“抢救运动”，诬称四川、河南两省中共地下党是“红旗党”，是国民党特务发展的。一批来自四川国统区的干部和党员有的被打成特务，有的受到株连。四川省委书记、有名的共产党员邹风平同志。当时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被康生迫害致死的（四川地下党员无不为之深感痛惜）。我父亲是在四川国统区入党的，同样被列为运动对象，受到批判和“抢救”，直到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整风运动的十条方针”公布，否定了康生的“抢救运动”后，许多受株连的同志（包括我父亲）才得到了彻底的甄别平反。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形势急剧变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部队分头进攻解放区，排除中共，单方接受日军投降。毛泽东同志针对时局，发表了“目前形势与我们

的任务”，中共东北和南方籍干部纷纷响应组织号召，报名到东北去，解放全东北。我爸爸也报名随延安干部队于十二月份到达东北。一九四六年沈阳被国民党军占领，中共东北局搬到哈尔滨。中共中央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让兵长路，占领两厢，放手发动群众，建党、建军、建政、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最后胜利。东北局机关干部立刻到农村去，到中小城市去，到工矿区去，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东北局组织部派我爸爸到鸡西煤矿工作。搞煤炭，他本来是外行，由于他一贯的学习刻苦，肯钻研业务技术，因而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很快就被提升为科长、副矿长、矿长、党委书记。成了懂得技术业务的煤矿领导干部。我爸爸生活艰苦朴素，常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们都亲热地称呼他为“小彭”矿长。他在鸡西煤矿工作期间，和一位普通的农村姑娘确立了恋爱关系，这个姑娘当时在矿里当话务员，她的父亲是矿上的马车夫，曾反对这门婚事（怕将来有变）。他们不顾家人的反对，终于结婚了，婚后卅余年的共同生活，我父母的感情始终是十分和谐的。

一九四八年十月，东北全境解放，爸爸调到抚顺西露天矿任矿长。采露天矿又是一项陌生的工作，他勤学苦钻，在西露天矿工作了十多年他就学习了十多年。工作、学习忙得他常常废寝忘食，顾不上家。这时他已有了一个男孩，夫妇二人一上班，就把孩子锁在屋里，孩子饿了自己到锅台上抓些剩饭吃，把屎尿拉在室内。那时我们的家住在古城子，而爸爸却住在坑北的宿舍，每周仅回家一、二次。

我父亲学习的顽强劲是十分惊人的，他白天抓工作，晚

上经常坚持学习到深夜，母亲十分为他的身体担心，可是劝他总不听。在西露天矿期间，他学完了高等数学，写了二十万字的笔记，学完了煤矿系的主要课程，取得了验收合格证。写出了《抚顺露天矿年度计划编制手册》，全书三百七十页、二十二万一千六百余字，书中的某些论点颇受专家和同行们的好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一些苏联专家和他接触，也称赞他的经验丰富，学识渊博。一九六二年，他被调任辽宁省设计院院长，一九六三年任辽宁省建设厅第一副厅长。在任职期时，主持了沈阳至抚顺污水灌渠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深受上级领导的称道。当时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同志很器重他，亲自提名他担任施工总指挥。

有一天，中共抚顺市委第一书记沈越同志由父亲陪同视察渠道，沈书记谈到抚顺露天矿的生产形势，希望他能回到抚顺露天矿主持工作。由于沈越书记的努力，终于把他要了回来，担任抚顺矿务局副局长，西露天矿矿长，代党委书记。由于他精通业务，重用工程技术人员，亲自到一线主抓生产，因此露天矿的生产形势一直处于上升势头。到一九六五年，年剥离量已达到三千八百二十三万八千立方米，较他未到职前的一九六一年增长了二千〇二十三万六千二百立方米，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三。这表明他“狠抓剥离、整顿运输系统劳动组织”是成功的。从一九四九年在一九六六年的十七年，是他事业上的“顶盛”时期。一九六六年一场“浩劫”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恶运”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他被加上了“西露天矿头号走资派”的罪名，被批斗、劳改、非法监禁。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清晨，一伙人强行将他劫持去沈阳，汽车行至沈抚公路马关桥附近，撞在路旁

大树上，父亲头部受了重伤，他们不送医院就医，仍旧把他关在辽宁大学他们私设的牢房内。几天后，妈妈闻讯赶去，几经交涉，才被迫允许就诊，经医生治疗后，才止住了鼻孔的不断出血。一九六八年八月抚顺市革委会成立，我们竟天真地以为这下爸爸可能得到解救，那想到迫害却比前更加升级，他被揪到各个车间去批斗，戴高帽、挂黑牌、罚跪，受尽各种折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两年间他没有回过一次家。一九七〇年七月，他突然被通知下乡插队劳动。随即就有几名士兵，用两部汽车，将我们全家载走，车行至新宾县汤图公社占贝大队的苏子河畔，便将我们全家扔下，我们徒步走到道沿村，住在一个刘姓的老农家里，这样，便在这个山村里渡过了两年多的可贵的时光。

一九七二年，周总理排除各种干扰，加快了解放老干部的步伐，我父亲终于恢复了工作，回城那天，全村男女老幼都来送行，这个场面，铭刻在我心中，至今难忘。

我父亲重新工作后，全力扭转矿山的生产形势。为了把运动期间遣散在各地农村的三百多名工程技术人员调回来，他亲自逐一排队，积极奔走。然而“四人帮”的徒子徒孙们却借机攻击他是搞“回潮”“复辟”。为着我三弟在学校填写家庭成份问题，由于我父亲不同意按剥削家庭出身对待，向学校陈述了中央的有关规定，“四人帮”的爪牙们获知此事，立即向其主子禀报，竟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认为我父亲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以致取消了他出国考察的资格。面对这幕闹剧，我父亲毫不在意，漠然置之，依然埋头干着自己的事，他翻译完了斯·斯古约夫的著作《外国的海底钻探》一书。



一九七六年，党中央为了加强各地新开煤炭基地建设，决定抽调一批懂业务的老干部来加强这项工作，煤炭部决定调我父亲到北京，调令刚一发出，“四人帮”的党羽们立即串联起来联名向中央组织部写信，诬告我父亲“走白专道路”，是“正在走的走资派”等等。然而紧接着“四人帮”的末日也到了，他们的爪牙也随之“树倒猢猻散”，作恶多端的，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落得了可耻的下场。

我父亲奉到煤炭部的调令后，作了些交代，便辞别抚顺——这个耗费了他半生心血的第二故乡，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踏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来到部里以后，马上接受了新的任务，不知疲劳地工作。他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先后到过霍林河、通辽、元宝山、宽洲等煤炭基地，了解情况，制订开采工艺。七六年唐山地震后，他顶着酷暑和余震前往考察，回来后赶写霍林河矿区开采工艺草案。一九七六年，有个美国煤炭考察团来我国访问，会见中，一位客人得知他已从事煤炭开采近卅年，热情地赠送他一支打火机，略表敬意。部里责成他负责霍林河矿区开采方案的制订，并着手就引进西德吕·贝克公司轮斗电铲一事准备谈判。霍林河矿区地质条件复杂，气候多变难测，大型轮斗电铲能否适应这里的开采条件尚须仔细斟酌。一九七七年七月，他又一次到霍林河（沙呼烈尔）矿区去“摸底”，对斗齿磨损影响最大的岩石硬度系数必须精确测定。两个星期后，他带着所掌握的第一手数据匆忙赶回北京，途经沈阳未顾及去抚顺探望儿子。因谈判日期迫近，他必须赶快拟就《吕·贝克公司会谈纪要》……然而就在他奔波忙碌之际，病魔却偷偷地向他袭来了。